

# 论墨家思想的渊源

萧鲁阳

上一次我们讲《墨子的姓名及其命名之旨》，在其最后一部分《大山可证》里，曾经说到，在墨子故里，河南鲁山县，有大山曰木札岭，又称没大岭，分别为墨翟（zhai）和墨翟（di）的音变。同一座山，有二个不同的读音，这二个不同的读音，都是墨子的名字，此或当然不是偶然。现在，只在此稍作补充，即这个木札岭，它的范围的确很大，包括鲁山县的西部高山以及由此向南的南召和向西的嵩县的大山。而传说的墨子故里鲁山县的尧山镇的竹园行政村的墨庙村，正在木札岭下。这是要加以补充的。尧山镇，古称二郎庙。改为尧山镇，那也是有来历的。在夏朝帝孔甲的时代，有养龙的刘累，迁到鲁县就是鲁山，他是尧的后代，“立尧祠于西山”，一般的说法，尧山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石人山。当开发石人山的时候，为吸引游客眼球，称石人山。而今开发成功，有人以为石人山名称不雅，又改回尧山。连带着索性连二郎庙也改称尧山镇。这是地名雅化的一个过程。地名取名有两个倾向，一是雅化，一是俗化。石人山是俗化的典型，尧山就是雅的典型。尧山镇，墨庙村，都在木札岭下，以此处的山证墨子故里、墨子姓名，是有道理的。这一点上一次强调的不够，所以现在稍作补充。

现在开始讲墨子思想的源渊，就是墨子或者说墨家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古到今，有若干种不同的说法，现介绍如下。

## 一、庄子主张墨子思想渊源于夏禹

庄子（前 369—前 286）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今商丘市民权人。有人说是山东曹县人，山东曹县与河南商丘搭界，故有一争。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说庄子是安徽蒙城人，此说今日影响甚大。但安徽的蒙地名甚晚，历史上那个地方叫山桑，不叫蒙。庄子的时代晚于墨子，也晚于列子，但早于孟子，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又是河南人，所以他的看法很值得重视。庄子说：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小腿

肚)无胝,胫(小腿)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跣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①《庄子·天下篇》)

庄子主张墨子思想源于夏禹,其特点是“自苦为极”,从生活时代上说,庄子距墨子的年代不远,从地域上说,庄子、墨子同属中原文化,《庄子·天下篇》也的确能抓住墨家思想的要点。所以,我以为庄子的说法,很值得重视。

与庄子此说相呼应的,有《淮南子·要略训》,《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所写的书,杂家,又叫淮南鸿烈,其《要略训》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鬲,以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南。当此之时,烧不暇擯,濡不暇挖,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②《淮南子·要略训》)淮南王此处所持的观点及其论证方法,与庄子相似。只是淮南子的观点尚不止此,此处所述,仅是其观点的一部分。

## 二、《吕氏春秋》主张墨家思想源于史角

《吕氏春秋》,吕不韦组织其门客撰写。吕不韦,阳翟人,就是今河南禹州人。有说他是濮阳人,今天看来,也是河南人。他是大贾,奇货可居,一字千金两个典故都因他而起。《吕氏春秋》是杂家,其中有抄墨家的,也有墨子书中所无之材料,是否都靠得住,则不可必。墨子书中有《所染》,《吕氏春秋》有《当染》,《当染》显然是抄《所然》而成。其中也有《所然》篇所无,他说: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有人据此将墨家的学术渊源于列史角的名下,然而,仔细考察,却发现《吕氏春秋》此说非常靠不住。为什么呢?

第一,主要是鲁惠公与周桓王的年代不相及,二人不同时。鲁惠公是鲁孝公的儿子,鲁隐公的父亲,在位46年,即公元前768年至723年在位,下距墨子生年约计二百八十余年。周桓王是什么人呢?周桓王是周平王的孙子,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崩,按理应由太子继承王位,但是当时太子方于郑国作人质,闻听平王驾崩,悲伤而死,未能登上王位,其子即平王之孙继位,是为桓王,在位二

十三年，公元前 697 年崩。依此，是鲁惠王之卒年尚在不王崩年之前三年，其又何能于地下派宰让向桓王请郊庙之礼？

第二，郊庙之礼，就是宗庙也即太庙之礼。清郊庙之礼，不是请教郊庙之礼，而是请求允许鲁国行郊庙之礼。这是天子即周王才可用的礼。鲁虽周公之后，虽有周公辅助成王的大功，但也不能用天子之礼，这是僭越，所以“郊庙之礼”，本身就不是鲁惠公所应请的礼。于此历代学者多有批评。明代河南人陈耀文有本书叫做《正杨》，其中就说过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大可怀疑。

第三，“惠公止之”，是说鲁惠公让史角留在鲁国。根据沈约注本《竹书纪年》，东周平王四十二年下有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王使史角如鲁谕止之。”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平王时，有道理，此时惠公、平王都在人世，可以发生交集。“平王派史角如鲁谕止之”，就是让史角前往鲁国说明请郊庙之礼越分，不合适，不从其请。

比较这段文字，《竹书纪年》说“如鲁谕止之”，《吕氏春秋》说“惠公止之”，前者说是周王不从惠公之请，后者说鲁惠公劫留了周王即天子的使臣，从道理上说，我以为应从《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所据文献来源与《竹书纪年》有相同处，但有舛误，加上一些相像的空间，就成了后来的样子。所以，“惠公止之”，应是“如鲁谕止之”的舛文。总之，我以为《吕氏春秋》这段话，基本上不可信，靠不住。基本上可以肯定，不存在史角留在鲁国这样一件事情。

后来有与《吕氏春秋》相呼应者，见班固《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汉书》卷 30《艺文志第十》）列墨学六家，有尹佚，无史角，有人说尹佚即史佚，其年代传说在西周成王时。《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自成体系，留待下文论述。

山东大学姜宝昌教授《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一文，第一部分：正论——高诱于篇中自有解，引了《吕氏春秋》的这段话：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高诱注：惠公，鲁孝公之子，隐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高诱注，止，留也。）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高诱注：其后，史角之后也。亦染墨翟。）

姜先生用《吕氏春秋》这段话中高诱注文，说明“墨子鲁人”之“鲁”，即后“惠公，鲁孝公之子，（鲁）隐公之父”之鲁。亦即吕不韦原文“鲁惠公”之“鲁”。

应视其为前注文墨子。鲁人之鲁之注脚。姜先生说，铁案如山，不容置疑。

根据上文我们对于《吕氏春秋》中这段文字的考察，它本身是靠不住的，此事不可能发生在鲁惠公时，鲁请郊庙之礼，大逆不道，不合情理，不是“惠公止之”，而是史角代表周天子明令鲁不得用郊庙之礼。以这些情况看，《吕览》这段文字不能支持姜教授的说法，姜教授的铁案也就很难铸成。姜教授动不动就想办成铁案，谈何容易？

### 三、司马谈主张墨家宗法尧舜

司马谈（？—前110），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的父亲，《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叙》，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礼必此为天下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学术史文献。司马谈的时代，儒家还没有定于一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比较自由，司马迁的《史记》也反映了这种情况。班固写《汉书》有许多史料与《史记》基本一致，但是班固是以儒家为尊的。这是《史记》与《汉书》的最大不同。依照司马谈的说法，墨家宗法尧舜。他所举的例子，大体与庄子一致，而且都可以在墨子书中找到出处。

在司马谈之前，便有人说过，墨子崇尚尧舜道的事。此人便是韩非（前280—前233），韩非是河南先贤，韩国诸公子，客死于秦。他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说过：“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卷《显学篇》）孔子和墨子都称道尧舜，但是取舍有所不同。都说自己是真尧舜。尧舜不能复生，那么让谁去确定儒墨二家谁说的是真的呢？韩非子的时代，天下的显学，就是儒和墨，儒的最高境界是孔子，墨的最高境界是墨子。以韩非的看法，他们都是效法尧舜的。韩非说出了一个事实，但有所存疑，即孔墨口中的尧舜未必便是真尧舜。读书是要有这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

后于司马谈的韩愈（768—824），也说儒墨同是尧舜，都肯定尧舜。“同非舛紂”，都否定舛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子有《修身篇》。“奚不相悦如是哉？”如此看来，儒墨二家有许多共同点，那

么为什么相互之间不欣赏对方呢？而且不欣赏对方还要到如此程度呢？“余以为辨生于未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韩愈以为这是儒墨二家的末学为了推销传售各自学派的观点造成的结果，并非是孔子和墨子的本意。“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强调孔墨二家的共性，他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孟子辟杨墨，加上后来儒家一尊，很多人不敢称道墨家。明代所印墨子书，大都把韩愈这段话印在前边，好像“文革”时期的“最高指示”一样。可知韩愈这几句话对于墨学的传播和复兴，功德是相当大的。苏轼就是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匹夫而为天下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言或有过之，但是韩愈关于“孔墨相用”的话，的确济了墨家之溺，就这个意义而言，苏东坡说的还真对。

#### 四、淮南子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写作班子所写的书。刘安是学神仙修道的，写出来的书属杂家。上文已说到，他与庄子相呼应，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那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淮南子·要略训》中有这么一段话：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繁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依照这种说法，墨家似乎出于儒家，墨子更似乎是孔子的学生。但是，墨子肯定不是孔子的学生，仲尼弟子列传，不见墨子；以年代论，墨子也不可能成为孔子的学生。至于所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可能是《淮南子》作者的一种错觉。淮南子的时代，儒学的地位已经很高了，诗、书、礼、易、乐、春秋，虽不称经，六艺的名称是已经有的了。墨子书中，引有诗、书、春秋，但和孔子所手定的古代典籍有所不。孔子教学生，用他手定的教材，《墨子》书援引古文献，与其有所不同，说明二者不同源，墨家另有所本。足证当时没有法定的统一教材。所以即使同是古《诗》古《书》，同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不能就称为“儒家之业”。“儒家之业”所教的，只是孔门弟子，说墨子受儒家之业无据。何况墨子所见的春秋是百国春秋，不是鲁春秋？

淮南子说以上这个话的时候，儒家一尊的地位已经形成。淮南子如是说，一方面可能是想为墨家赶一下时髦，为墨家赶时髦，也就是为自己赶时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贬低墨家。我曾经说过这个说法，有点像提前出世的《老子化胡

经》。因为此前墨学为世之显学，那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以为，淮南子的这几句话，基本上不可以成立。

需要指出的是，淮南王刘安所说的“孔子之术”这个提法，我以为大有来历，即它可能出于汉儒董仲舒。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经，常也），古今之通谊（谊，义也）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方，术也，法也），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我以为，刘安的孔子之术，乃从董仲舒的孔子之术出。刘安与董仲舒大致同时，只是董仲舒的大一统，独尊儒术很有名。依我的看法，“孔子之术”这一范畴的发明权或知识产权，应属于董仲舒。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依我粗浅的看法，就是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与墨家所说尚同，有相通之处。董仲舒主张用孔子思想统一意识形态，是他的要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他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意识形态。多元化，有其极其有害的一面。中国历史走向，天下一统，是人心所向，应该说其中董仲舒功不可没。有人说，统一意志近乎独裁，多元化就是民主，是也非也？这个事情需要讨论。

刘安在《淮南子·要略论》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是在董仲舒提倡大一统、崇尚儒家思想的背景下产生的。《要略训》说儒、墨、管子、晏子、纵横、刑名，商鞅等诸家都是适应社会需要而生的，这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原不在其来源。淮南王对自己的书籍评价颇高，他说：“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治，元渺之中精摇靡览，弃其軫挈，斟其淑理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路，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于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自我感觉确实良好，但是事实究竟如何，自是另当别论。

## 五、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起源于清庙之守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皆出于王官。《汉书·艺文志序》称：西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会向卒（遇上刘向病死），哀帝复使向子（汉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让刘向的儿子刘歆完成其父的未

竞之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伎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

这几句话，交待了《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系和分类体系，也说明了《汉书·艺文志》乃删取刘歆《七略》而成书，所以，《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实即刘歆《七略》的说法。以后，看到班固说诸子出于王官或刘歆《七略》说诸子皆出于王官时，不要觉得奇怪。他们是二而一的事情。

汉志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盖出于社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本十家。（原文有“其可观者九家

而已”之语。故但言九流。）

近人有附和这一说的，如章炳麟，就是章太炎先生。有反对这一说的，其持论最有力者，是胡适。胡适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特别指明墨家不出于王官。胡适说：

此所说诸家所自出，皆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聪明也。夫言诸家之学说，间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如阴阳家之近于古占侯之官，此犹可说也。即谓古者学在官府，非吏无所得师，亦犹可说也。至谓王官为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以法家为出于理官，则不独言之无所依据，亦大悖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矣。今试论此说之谬。分四端言之。

胡适特别指出：

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

谓儒家为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梦见。此所施教，故非彼所谓教也。此其说已不能成立。其最谬者，莫如以墨家为出于清庙之守。夫以“墨”名家其为创说更何待言。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

《七略》之言曰：

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无一不谬。墨家贵俭，与茅屋采椽何关。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不更俭耶。又何不谓墨家为出于洪荒之世乎。养三老五更，犹不足以尽兼爱。墨家兼爱，本之其所谓“天志”，其意欲兼而爱人，兼而利人，与陋儒之养老异矣。选士大射，岂属清庙之守。其说已为离本。至谓“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则更荒谬矣。墨家爱无差等，何得宗祀严父。其上同之说，谓一同天下之义，与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无关系也。墨家非命之说要在使人知祸福由于自召，丰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若“顺四时而行”，适成有命之说。更何“非命”之可言。

我以为，胡适的说法是深刻而有道理的。论证探讨至此，应该可以定论。近年，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探讨《墨家学说对中国社会发展之影响》，第一章墨家学术渊源考，论的就是墨家与清庙之守，说“节用”应与古代清庙的节俭体制、作风流传是有关联的。认为“兼爱”学说，与三老五更的古代制度是有关联的，认为“尚贤”学说与古代的大射选士制度，是有一定学术关联的。郑杰文先生虽然承认汉志的说法有片面性，但又认为其有一定道理。我以为郑先生的说法还未能否定胡适的说法。何况，既称史角，便已说明他是史官，而非清庙之守。说史佚史角都是清庙之守，不知道有何根据？依我看，史佚，史角都是史官，不是清庙之守。

## 六、墨子与史佚史角

史佚是西周初年的人物，史角是鲁惠公时人，汉书艺文志墨家大类首列《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时也。墨子书中，既不言史佚，亦不言史角。史角无书。人说史佚即尹佚。郑杰文教授以为，史佚、史角都是清庙之守，用的是章太炎的说法。即他用的是被胡适已经驳倒的说法。

史角事已见前述。郑杰文教授不考史角事的年代舛误，不说《吕氏春秋》与

《竹书纪年》的不协调处，硬要把墨子挂在史佚史角名下，乃为墨子在山东找一身处作铺垫，打基础。郑杰文教授沿用刘安墨子学孔子之术的说法，并具体说墨子从孔子弟子宰我的弟子学。宰我就是宰予，宰予昼寝，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就是他的故事。宰我有“井仁”，“期年之丧”、“使民战栗”的说法，郑杰文教授“微言天义”，将之与墨家相比附。关于这一点，我总感他虽然极力把墨子往孔门弟子靠，但终究欠缺说服力。郑杰文教授把淮南子墨子学儒家之业的说法具体化，细致化，作了许多探索性的努力，但他那个结论，我以为还不能成立。郑杰文教授为其家乡山东所作的努力，值得欣赏。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说法，但他发掘文献，深入钻研，这个精神值得欣赏。郑杰文教授勤奋的精神值得肯定。

### 七、墨家与鲁之臧氏学术无关

鲁之臧氏，说的是鲁国的臧哀伯、臧文仲和臧武仲。章太炎先生说墨家与臧氏之学有渊源关系。

墨家则鲁之臧氏近之。观于哀伯之诗，首称清庙，已似墨道。及文仲纵逆祀、祀爰居，则明官之效也。妾织蒲则节用之法也。武仲见称圣人，盖以巨子自任矣。

今按：1. “哀伯之诗，首称清庙”，事见《左传·桓》二年（前710），说的是鲁取郕大鼎于宋，纳于太庙，臧哀伯曰，其中提到清庙二字，章太炎据此说首提清庙，显系穿凿。

2. 文仲纵逆祀，祀爰居。臧文仲是臧哀伯的孙子，名辰，文是他的谥号。臧文仲是他身后的称呼。“纵逆祀”，事见《左传》文二年（625）。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逆祀也。说的是升僖公于闵公上。《史记·鲁世家》谓闵为兄，僖为弟；《汉书·五行志》谓僖是闵的庶兄。无论为兄为弟，僖公既然继闵公后，今升其位于闵公之上，都不合适，臧文仲是国家元老，不能以他的影响力改变此事，所以叫做逆祀。有名的典故“新鬼大、故鬼小”就是从这里来的。

“爰居”，是一种海鸟，据说有八尺多高，《国语·鲁语上》说，爰居止于鲁国都门之外，臧文仲遣人祭之。章太炎先生借这二个故事相说明墨子明鬼与此有关，恐怕无法成立。

3. “妾织蒲”，织席贩卖，旧时代官宦之家不事生产，出发点是不与民争利。章太炎先生以为是节用之渐，看法与常人不同亦殊牵强。

“武仲见称圣人”，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551）春，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御邑，今山东郓城县东十二里御屯，御叔，御邑之大夫）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杜注：武仲多知，时人谓之圣。武仲出行而遇雨，不知晴雨，何以为知且圣？）《孔子家语·颜回篇》，“武仲世称圣人”。便由此来。章太炎说“盖武仲以巨子自任”，说得毫无根据。详细介绍这些材料，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章太炎先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总之，墨家源于鲁国臧氏之学，依现有材料而言，我以为无法成立。

#### 八、杨义说墨家与东杞的关系，墨家源于夏禹的支脉

杨义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以诸子为文化上的先驱和思想上的朋友，有《墨子还原》之作，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撰写特点之一，是采用了“长编法”。长编法创自北宋司马光，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先作“长编”，后在长编的基础上修成《通鉴》。南宋李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写北宋一代历史的，作者不敢说是成书，不敢说是《续资治通鉴》，只敢自称是通鉴长编，是谦词。《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宋史的基本文献之一。杨义作《墨子还原》，用长编法，是他将有关资料编排，附在书后，以示去取之有据。所以《墨子还原》一书分上下编，上编墨子还原；下编墨子还原研究资料长编。所以，我说他的写作特点之一，是长编法。

杨义研究员的书以山东东南即“鲁之南鄙”作为墨子的老家，为了调和或者维护此说，在述及墨家思想渊源的时候，自然要说到禹和夏文化。杨义说：“墨学发祥于东夷近鄙。”（页9）说周武王封以夏侯氏之杞的杞国，两周之际受宋与淮夷的侵伐滋扰，东迁到鲁东北，清人许瀚已确认“鲁东北者，即新泰也。”这就使杞国（按新泰的杞）成为墨子故里（按：此谓山东滕州）的近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杞，夷也。”《左传·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杜预注云：“杞先代之后，而迫于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又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杞国的东夷化，当使墨子寻找夏政风和禹风时，增加几分亲切感。（页10-11）

杞是夏人之后，“殷时或封或灭”（《史记》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后，封之于杞，这个杞，是今河南的杞县。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言

之”，说的就是这个杞。当东西周之际，杞国东迁山东，就是上文有人说的新泰。杞东迁东夷，染东夷之风，他没有用夏变夷，而是入乡随俗，以夷变夏。东迁的杞，于楚惠王四十四年亡国。东迁山东的杞，已非夏文化，而是东夷文化。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当公元前 637 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本来是公爵，《春秋》书子，《左传》说：“书曰子，杞，夷也。”是说他已是夷文化，不再是夏文化，故而贬称为子。

《左·襄》二十九年，当公元前 544 年。晋平公十四年，杞文公六年，这一年有二件大事与杞相关。一是晋平公治杞，一是晋平公使司马就是国防大臣女齐叔侯治杞田。前一件事说的是晋国让诸侯国为杞修城墙，引起诸侯国的不满。后一件事是晋国派防长就是司马女齐侯帮杞国讨回被鲁国夺取的土地。两年事的起因，即晋国为什么要替杞国出头？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国君的女儿，晋国的国母发令，平公不能不听。晋的司马就是防长并不乐意此事。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杜注行夷礼。杞是夏的子遗，而与东夷相近，已经行夷礼，是东夷文化。“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鲁、晋同为姬姓，两国的关系非常亲近。防长说鲁近，杞远，无意于帮杞说话。从《春秋左氏传》所载，我以为无法得出墨子以杞为精神家园的结论。

墨子书中称禹达 56 次之多，独立称禹 22 次，禹汤并举 5 次，称尧舜禹汤文武者 9 次，称禹汤文武者 9 次。墨子书无一字及于“杞”，说墨子以东杞为思想渊源发祥地，怎么可能呢？

杨义研究员主张墨子是草根显学。而草根文化的基因，“离不开地域族群文化的遗传”。注意到墨家思想的地域文化特征，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杨义把墨子或墨家地域文化的基因，局限在鲁之南鄙，“鲁之南鄙”一词出自《鲁问》。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又怎么知道它不是鲁阳的南鄙？杨义研究员把它说成鲁国的南鄙，也还罢了，为了与吴虑见面的方便，杨义研究员把墨子里籍也定在鲁之南鄙。接着，杨义又把鲁之南鄙扩大为鲁国之南，他说：

鲁国之南，是《禹贡》所说的北至岱泰，东至海、南及淮的古徐州，《文献通考·輿地考》谓春秋时可考者十四国：鲁、薛、邾、滕、鄆、纪、郕（小邾）、萧、宋、牟、颛臾、偃阳。其实还应加上邾一分为三的濫国、邳、费，以及春秋时已迁到鲁东北的杞。（《墨子还原》页 8）。

杨义说，这块地方的土著居民就是东夷族群，周公践奄，伯禽封鲁，“鲁成为周礼久传不衰的中心，它的底层社会仍然延续夷风。”（同上书，页9），这种情况或许存在。但下面二句话就有些叫人费解了。杨义说：“墨子既生于鲁之南鄙，又流动于鲁南鄙相邻的诸小国之间”，（同上书页9），根据是什么？凭什么说墨子既生于鲁之南鄙？又凭什么说墨子流动于鲁南鄙相邻的诸小国？鲁之南鄙怎么变成了鲁以南诸小国，鲁之南鄙怎么又包括了鲁国东北的杞？杨义研究员以上所说十几个国家，鲁与宋固然见于墨子书，可是除此之外，薛，邾、滕、徐、郕、纪、邠、萧、牟、颛臾、邾、邳、费、杞、偃阳，曾无一字及之，把这么广大的地域统统都说成是墨子的出生地，居住地，流寓地，流动地，理由不足，无法服人。杨义研究员的书，证明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文采的人。只是他的持论有些不够平稳。他的路向他的方法有时发人深思。杨义研究员说要还原诸子，他也自以为是还原了诸子。其实，未必然也。诸子能否还原？杨义说还原就还原了吗？不见得。

## 九、薛柏成的看法值得重视

薛柏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墨家思想的渊源及历史影响》以《墨家思想新探》的书名出版，关于墨子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问题有很好的意见，今移录于下，以供参考。

薛柏成教授说：这个问题可谓众说纷纭，有源于夏禹，源于尧舜，源于殷商文化，源于易，源于儒家，源于道家，源于武士（按：冯友兰有此说），源于生产实践和救世之弊等说法。薛柏成认为，其中源于夏禹说很有代表性。此说注意到了以夏禹为代表的夏政对墨子思想形成产生的深刻影响，但未注意到墨家思想的渊源是受包括以大禹为代表的禹汤文武周公亦即“三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关于墨子源于殷商说，台湾学者黄世瑞认为墨学源于殷商文化，与母权社会遗留有关。薛柏成说：他只是注意到了三代文化中母权社会遗留因素。关于墨子思想起源尧舜说，薛柏成说此说其实与墨子所称道的“禹道”在实质上并无任何差别。侯外庐认为孔墨二字都源于对春秋具文儒术的继承与批判。王冬珍说墨家思想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薛柏成说他们都有一定道理，又都缺乏进一步论述。陈柱《墨学十论》说墨学源于古代典籍，罗根泽《诸子考索》、王桐龄《儒墨之异同》等书，都有所论及，薛柏成认为这些研究都显不够，在吸收发展上研究不

够。关于墨家源于易，薛柏成认为方法新颖，“但仅以象数与卦象为据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关于自然环境即地域文化因素对墨家思想形成的作用，很少有人论及。现在有人作了这种尝试，只是先入为主，围绕墨子里籍滕州说作文章，持论有些偏，我以为他的理由不充分。

我以为，墨子的夏道，即禹之道，即尧舜禹汤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墨子思想源于禹，可说是禹于以夏道为代表的三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这只是墨子思想的一个源。墨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战国社会需要的产物。他为并世之显学，绝不是在书本上产生的。社会需要改变，生活呼唤理论，学说才会产生，所有学说，都是为救世而产生的。墨家思想更是如此。

薛柏成教授认为，墨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并不限于某个方面，所以关于某个方面，所以关于墨家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薛生之说，见其《墨家思想新探》及《墨子导读》二书。

我以为，薛柏成教授的看法是客观的、理性的，也是值得特别重视的。薛柏成问学用功，学风很正。当然他的书中也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出版物情况的信息反映，此不足为奇也。

#### 十、关于墨家思想渊源研究的几点看法

木有本，水有源，世间没有无根之物，也没有无缘之事，墨子思想当然有其渊源，当然有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只是纵观各家关于墨子思想渊源的说法，诚然可谓之众说纷纭，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其中亦不免有如瞎子摸象者。所以，关于墨子思想渊源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墨子思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瑰宝，他以大禹精神为代表，继承了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文化精神。台湾学者王冬珍说墨子思想渊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王赞源也持此说，二人合作的《新编墨子》（台湾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王冬珍《墨学新探》台湾世界书局印行）皆持此说。孔子无疑是超级文化巨人。淮南王刘安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儒墨为并世之显学（见韩非），“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墨”（见孟子）可知先圣之书，六艺之论，不为儒家所独有，所以以墨子出于孔门，或继承孔门精华，这个提法，我有些无法接受。说墨家思想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则可，说源于孔子则似不可。

韩非认为，儒墨二家都称尧舜道。尧舜道也就是先王之道。《墨子·鲁问》：

“颂先王之道而察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可知墨子称先王之道，重在行，重在救世。另外，作为研究，既要看到儒墨同称尧舜道，又要看到二家之异，而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没有差异，那么儒不成为儒，墨也不成为墨。韩非说了异中之同，同时不可不研究同中之异。《史记·太史公自叙论六家要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司马谈的论说可以给人以更多的启发。

孟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古籍，或曰古典文献，流传不易，能流传至今，当然可贵，但也未必可以尽信。典籍是历经校理的，然而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吕氏春秋》说鲁惠公求郊庙之礼，墨子学于史角的后人，这条文献便靠不住。读墨，校勘学仍不可少。

研究墨子思想渊源，贵在总体上把握，最忌讳的是在古籍之中寻得一鳞半爪，便大加比附，贴上标签，说与某家相联，或影响到某家。诸子各家，有自己的特质，不能因为某一共同的用语，就混为一谈。墨子强本节用，毛泽东时代号召增产节约，不能相提并论；老子说，吾有三宝，曰慈曰简，不为天下先。《论语》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我以为仅依此而说墨子思想源于道家或孔子，那是不妥的。用墨子思想研究墨子，以墨解墨。西汉以后，儒家为尊，墨学衰微，人们的思维定式中，有意无意之间，儒家的传统很多，要真正做到以墨解墨，还得作许多努力。如果说无意间以儒解墨，那也还罢了。可怕的是有人有意授墨入儒，比如想方设法给墨子指定一个儒门弟子作老师。

墨子有三表法之说，很是高明。《墨子·非命上策三十九》说：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型政，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不是从书本出发的，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目的性很强，“中国家人民之利”。我以为，研究墨家思想渊源，不可忘记墨子的“三表法”。

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墨子思想渊源研究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墨子书中记载墨子所到过的地域，相当广大，这些地方或许对墨子思想都会有所影响。墨行夏道，

他的核心是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核心在中原，司马迁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寻找墨家思想的根，应到这个地区。东夷文化，不是产生墨家思想的源，尽管有人为此说得头头是道。中原地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努力。

墨子思想当然有其渊源，墨子思想是实际需要的产物，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墨子·鲁问第四十九》说：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葬、节用；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

所以墨家学说是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禹之道，先王之道，大致为墨子所本；国家昏乱，国家贫，熹音湛湎，淫辟无礼，务夺侵陵，就是百姓耳目之实，是现实社会，即墨子原之者；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就是用之者。所以，墨子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墨子有感于百姓之苦，有感于社会之乱，创造了完整的体系。社会现实是墨家思想最重要的源。

（2012年8月24日晨）